

# 浅析“战国策”派的领袖观

周若清 伍春辉

(长沙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湖南 长沙 410100)

【内容摘要】“战国策”派是抗战时期涌现的非理性主义思想派别,他们由英雄崇拜引申出领袖服从,并对当时的国民党领袖蒋介石进行了颂扬,折射了这部分知识分子政治上的天真与幼稚。

【关键词】“战国策”派 抗战 英雄崇拜 领袖服从

中图分类号 K2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0)02-0113-03

“战国策”派是抗战时期涌现的非理性主义思想派别,有学者认为,“从本质上讲,‘战国策’派不是一种政治思潮,而是一种文化思潮。”<sup>[1](P18)</sup>笔者深以为然,因为战国策派所规划的有关文化重建方面的构想无不昭示其文化上的深远意义,但战国策派长期以来深受诟病,其焦点和原因恰恰落在政治思想和政治主张之上,这又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

## 一、元首问题是政治的基本问题

基于中国知识分子经世致用的传统,“战国策”派对政治投注了关切的目光,围绕元首问题发表了系列颇富个性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的元首制度“根深蒂固,由内在的力量方面讲,可说是永久不变的,只有非常强烈的外来压力才能将它撼撼。”要想在政治领域破旧立新,“在未来中国的建设中,新的元首制度也是一个不能避免的大问题。”<sup>[2](P21-122)</sup>

抗战时期对元首问题的特别关注,是符合“战国策”派爱国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和身份的。民初以来,中国四分五裂之政治僵局始终未破,地方与中央间关系难有和谐,外无强敌的情况下,维持这种状况尚且遗祸子民,外患渐深时,这种状况再不改变,势必酿成滔天大祸。因此建立一种元首制度,通过合法的程序,选出大众认可的,既能号召群众,稳定民心,又能组织群众,一致对外的元首在当时是十分必要的,因而“战国策”派加大了宣扬元首制度的力度,希望能为抗战培育出一种健康的元首制度。

雷海宗对元首制度和元首问题阐述最多。他认为,兵是“民族文化基本精神的问题”,家族则是“社会的基本问题”,“元首可说是政治的基本问题”<sup>[3](P198)</sup>,从而将元首问题放到了政治问题的核心地位。政治问题扑朔迷离十分复杂,“但最少由表面看来,一个固定的元首制度是最为重要的。因为政局的稳定与否,就由元首产生时的平静与否而定。近年来

吃了群龙无首的大亏后,国人已渐觉到首领的必要,此次抗战尤其增进了这种认识,我们已有了全民族所绝对拥护的领袖。毫无疑问的,这对将来政治问题的解决可以有莫大的帮助,但这个问题微妙难言。”<sup>[3](P190)</sup>从而指出了元首问题在政治语境中所处的地位。

## 二、英雄崇拜是领袖服从的理论依据

“战国策”派关心元首问题,并将其视为政治的基本问题,与其提倡英雄崇拜是吻合的。“战国策”派中的陈铨是宣扬英雄崇拜最为卖力,另两位主要人物林同济和雷海宗在这个问题上相对而言要理性一些。

陈铨认为,正是因为中国人不搞英雄崇拜,失去了心中的英雄,以致“这次抗战,更没有人拼命”<sup>[4](P900)</sup>,要想继续抗战,挽救民族于危亡,必须倡导英雄崇拜。

他还认为,英雄在历史上一直起着一种不可替代的作用,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我们应该“不要无知的群众,要伟大的个人,才可以担当这个严重的责任。”而“历史的工作,就是要传达这一个使命,供给动机和力量来产生这样的伟人,人类整个的目的,就是要产生这样的人物。”<sup>[4](P258)</sup>他还千方百计地强调英雄的突出作用,认为“人生是一局棋,超人是国手,人类不过是他用的棋子”<sup>[4](P261)</sup>,随时供他驱使。因此时代需要我们崇拜英雄,但是英雄崇拜又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在当时也颇有争议。提倡英雄崇拜,首先必须回答这样几个问题:什么样的人物才是英雄,怎样来崇拜英雄,如何区分英雄崇拜与盲目迷信等等。

陈铨对这几个问题作了简浅的回答,他认为,英雄就是天才,他是“人类的精华,是推动文化社会进步的原动力,是指挥群众的司令官”<sup>[4](P286)</sup>,但是陈铨没能够具体指出什么样的人才真正意义上的所谓“人类的精华”,因而谁也不敢

\* 本文为湖南省教育厅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课题编号 09C002)。

\* 作者简介:周若清(1975-)男,长沙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部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和思想政治教育。伍春辉(1974-)长沙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校长,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和教育管理。

担保没有伪装进步实则反动的人物混迹于英雄中滥竽充数。陈铨区分了“英雄崇拜和奴隶服从是不一样的”。认为英雄崇拜是因为相互间的吸引和出自内心的惊羨,“没有利害的关系存乎其间”<sup>[4](P296)</sup>,而奴隶的服从,是一种利用和谄媚,双方是有害关系的,因而前者高洁光明,后者卑鄙混浊。

贺麟区分了崇拜英雄和服从领袖的不同。他认为崇拜英雄是人的一种情感行为、心理行为,而“服从领袖是实用行为。为着社会组织、法律纪纲、行政效率,我们不能不有领袖,我们不能不服从领袖。假如领袖是英雄,我们固然是服从,有时领袖虽不是英雄,但为实际方便计,亦须服从之,因为不服从领袖,就没有坚固的团体组织、团体涣散,国必乱亡。”<sup>[4](P305)</sup>英雄固然要崇拜服从,领袖不是英雄也照样要崇拜服从,这就有点的味道。贺麟同时也认为,“英雄崇拜不是属于政治范围内的实用行为,乃是增进学术文化发展人格方。”<sup>[4](P305)</sup>而领袖服从显然是属于政治领域的行为。“真正的领袖,无论古今中外,并不是全知全能的超人,乃是虚怀若谷,认识英雄,崇拜英雄,而能以至诚结纳贤豪,得其死力之人。”<sup>[4](P310)</sup>如此看来,他并不是要人笼统地去服从领袖,而是应该真心实意地拥护“真正的领袖”,然而他定义的领袖无异以江湖侠义号令群雄的武林盟主,远离了政治的意义。

沈从文则认为生于20世纪的对英雄的态度应该是“大事信托,由信托而生敬重,不必迷信崇拜,尊之若神”。要维护英雄的权力,发展英雄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人们的盲目崇拜,而在于“中层分子各方面的热诚合作!”<sup>[5](P145)</sup>沈从文由英雄崇拜推及到政治领域中的领袖,他认为,“真的领袖都有意将英雄崇拜情绪转移到娱乐或致用方面去,个人却承受了‘民治主义’一个对于‘人’的原则,‘领袖也是一个人,并不是神’。他要人相近,不要人远离。要群众信托爱敬,不要迷信崇拜。”<sup>[5](P147)</sup>沈从文分析了英雄崇拜的害处,认为盲目地服从领袖,只会使领袖闭目塞听,盲目自大,这其实不是真正的领袖所希望的。

为回应沈从文等的质疑,陈铨又撰文指出:“造成反对英雄崇拜的心理,还有一个坚强的根据,就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自我要求伸张,团体的利益可以置之不顾”<sup>[4](P318)</sup>,当然也不会承认英雄,更谈不上佩服和崇拜英雄。真正能够无条件崇拜英雄的人,正表明他自己本身中也有英雄的成分。”<sup>[4](P317)</sup>

除沈从文外,战国策派学人大多都认可了英雄崇拜。在他们的理想中,英雄崇拜是一种高尚的人格,他们认为现实政治生活中的英雄当然首推政治领袖,因此他们对政治领袖持一种颂扬和服从。

### 三、“战国策”派对现实政治领袖的颂扬

在抗战中,蒋介石政府是当时国内公认的合法的中央政府,其领导下的国民党军队实力最为雄厚,装备最为精良,人数最为众多,而蒋介石本人在抗战初期也表现出了相当的积极性,因此当时的国人,包括中共在内,从抗战的需要出发,均视蒋为领袖,表示拥护其抗日。“战国策”派一方面要求积极抗日的,另一方面又积极主张英雄崇拜,因而对蒋介石还是表示了相当的好感。

林国济在《士的蜕变——由技术到宦术》中,视蒋介石为“希世的当轴”,“不断地在上头转着万钧的臂力”,发挥着

“振衰起微”的作用<sup>[4](P83)</sup>。岱西在《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中认为:“中国人绝不是一个驯弱的民族,乃是有素的独夫杀手。四周环绕的,尽是英雄崇拜的国家,而我们总不肯佩服我们的领袖们,你说如何其可!”<sup>[4](P226)</sup>林同济将中国的不妙处境归咎于民众缺少对领袖的崇拜,可是对中国向来缺少真正意义上的领袖,他却只字不提。

陈铨也着重突出了蒋介石,陈铨认为,“蒋委员长创办黄埔军校的时候,许多青年,因为佩服蒋先生的精神,北伐之役壮烈牺牲,造成中国近代历史上光荣的一页,提到这一批热血青年,我们能够不肃然起敬吗?”<sup>[4](P298)</sup>北伐成功,首先源于国民革命精神的感召和孙中山的人格魅力,蒋介石的个人影响尚无从谈起。陈铨如是说,笔者认为其意在鼓舞全国有志热血青年能借鉴往事,投身抗战,血洒疆场,在所不惜。然而对蒋介石的这种颂颂,在敏感时期又很容易视为露骨的投靠反使人失去了对其深层次含义的追寻。

王赣愚虽然也认为蒋介石这个“操纵全国党政军大权者,不但是个当代规模军人,而且是个有卓识有魄力的政治家”,“国家得此领袖,民心有所寄托”,我们应该感到“侥幸万分”<sup>[6]</sup>,接着他又指出,“政治领袖,在战时是极端的必需,其最大作用在决定最高政策,以求全国意志之统一。尤其是广土众民的中国,在当前大非常环境中,似乎惟赖有大非常的政治领袖,才能够负起抗战建国的重任”。但王赣愚反对领袖集权,而主张政府集权,认为这才是中国需要的战时集权。他说道:“战时集权却未因领袖制度的确立而得到真正健全的发展”,“此中主要原因,就是在我们提高领袖地位之后,竟忽略了‘战时集权’的重要性,结果仅得‘领袖集权’而未能达到战时所期求的‘政府集权’。”王赣愚对领袖集权与政府集权也作了区分。首先他承认“领袖集权与政府集权有异。前者一切集中于一人,后者则制度化而集中于中枢行政机关。”在他看来,两者又是有关联的,“‘政府集权’乃实现‘领袖集权’的途径,可以充分发挥领袖集权的效力。”但他不主张只有领袖集权而忽略行政集权,因为强调领袖集权,对于领袖本身而言,“耗精力于琐屑”,反而失去了领袖作为行政首长进行宏观把握的本来意义,而对于国家行政而言,也会“招致系统的紊乱,责任的不明和效率的低下。”这样对于抗战大局无疑是制造了困难。同时,行政人员“过分依赖领袖,事无巨细,非请示莫辨,可使整个政府人员无生气,失去自动能力与意志。”<sup>[6]</sup>对于抗战前途更是一个巨大的阻碍。

“战国策”派中的陈铨等人倡导英雄崇拜,主张领袖服从,寓意明显。他们认为唯有如此,才能够在领袖的统一调度和指挥下进行抗战,从而在这场国运攸关的大战中获取胜利。他们理想中的英雄都是正面的积极的富有号召力,他们认为当前的领袖也如英雄一样英勇、果敢、受人尊重、令人倾倒、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人物。因此,他们欢呼、赞颂,他们崇拜、服从。

当然,“战国策”派对蒋介石的颂扬在当时也确实是合乎情理的。他们希望全国大众团结在蒋介石周围,为战胜日本,赢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而奋斗,这种良苦用心也不难理解。然而他们不了解蒋介石是一个变化中的人物,他由原来国共对峙时期的积极反共到后来抗战爆发时的联共抗

日,符合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是一个可喜的变化,但是随着日本诱降政策的出台和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扩展,蒋介石的抗日积极性下降,对中共的戒备心理增强,在这个时候,如果只一味盲目地吹捧和赞颂,无疑是难以获取足够支持的。

同时,也正如王赣愚所言,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过分依赖个人,可能会形成一个坚固的核心,从而有统一的行动和指挥,但是作为领袖,如果事无巨细,事必躬亲,无疑只能使下属俯首贴耳,失去了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

####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战国策派强调元首制度,大部分的原因与他们强调集权或专制是如出一辙的,即为了抗战的需要。他们希望通过倡导英雄崇拜,提高领袖的权威,造成一个可以带领人们与日本展开殊死搏斗,赢得抗日战争胜利的领袖,即蒋介石。现在看来,“战国策”派无论在学理上,还是在现实政治操作上,都犯了显而易见的错误。强调英雄的作用并无不妥,但忽视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则更为可怕,这是英雄史观和群众史观的争辩,笔者无需赘述。知识分子的担当与责任在“战国策”派的字里行间体现得淋漓尽致,但是知识分子在政治权谋上的发达却远远逊色于

职业政客。如蒋介石的人格并非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崇高,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也并非始终积极坚持抗战。当蒋介石的面纱尚未揭开时,他们的吹颂尚存合理,一旦蒋介石暴露出丑恶嘴脸后,战国策派应该及时修正以前的认识,这才是明智之举。

参考文献:

- [1]江沛.战国策派思潮研究[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 [2]雷海宗.中国的元首[A].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A].民国丛书,第1编,44.
- [3]钟离蒙,杨凤麟.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3集第3册)[C].辽宁大学中国哲学史研究室编,1982年,P190.
- [4]温儒敏,丁晓萍.时代之波——战国策派文化论著辑要[C].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
- [5]沈从文.读英雄崇拜[A].时代之波[A].民国丛书,第1编,44.
- [6]王赣愚.关于我们的战时行政[J].战国,第15期.
- [7]何友恪.论英雄和英雄主义[J].中国周刊,第五卷第16期,1942.11-26.

(上接第110页)理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会议,马叙伦在开幕词中指出,会议将“集中力量解决接受美国津贴的学校问题”,而对于“接受其他外国津贴的学校除政治上坚决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者以外,目前一般地只采取履行登记,督促他们逐步改造使其适合于中国人民利益的方针”,并进一步重申了处理办法的要点<sup>[12]</sup>。同月18日,北京市政府决定,本市所有接受外国津贴及外资经营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到指定地点进行登记。在此基础上,政府有关部门对这些学校分别采取由政府接管,改为国家事业,或由私人、团体继续经营,改为中国人自办的事业,其经费有困难者,政府予以适当补助。经过调查研究和酝酿协商,确定由教育部及卫生部分别接收由美国津贴的燕京大学和协和医学院。学校中的美籍董事一律解职,美籍人员不得担任行政职务,美籍教师思想言行反动者辞退,其余留任;中国籍教职员工一般原职留用,待遇照旧。与此同时,北京市教育局也接办了教会办的中学和小学。中学16所,其中天主教會的6所,基督教会的9所,万字会的1所。小学19所,其中天主教會的14所,基督教会的5所<sup>[13][P141]</sup>。

参考文献:

- [1]中共北平市委关于大学的处理方案向中央并华北局、总前委的请示[A].北京市档案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C].北京市政府教育局整顿本市公私立中等学校学生临时救济金决定》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
- [2]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的和平接管[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

- [3]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文献(1949—1975)[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
- [4]刘英杰.《中国教育大事典》(1949—1990)上册[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
- [5]《中央人民政府法令汇编》第1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82.
- [6][美]杰西·格·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
- [7]北京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北京师范大学校史(1902—1982)[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
- [8]柴松霞.建国初期私立学校改造措施的考察——以北京地区为例[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5).
- [9]张寿颐.建国初期北京中等学校的接管与整顿[J].北京党史研究,1997(2).
- [10]王雪洁,陈属苹.建国初期北京市对私立中学的接办工作[J].北京党史,2006(3).
- [11]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关于接办私立中学和部分私立小学情况向中央、华北局宣传部的报告[A].北京市档案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C].北京市政府教育局整顿本市公私立中等学校学生临时救济金决定,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732—733页,733—734,734.
- [12]马叙伦.处理接受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会议的开幕词[J].人民教育,1951(4).
- [13]周鸿主编.北京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00.